

不稳定工作、性别观念与家务分工：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夫妻匹配数据为例

刘爱玉 姜凤姝 罗聪聪

摘要：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的夫妻匹配数据，研究考察了不稳定工作与家务分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稳定工作的常态化与去性别化形塑了夫妻在家庭场域中绝对资源、相对资源的拥有状况，丈夫的相对资源依然在家庭中具有优势地位。工作的性别化诠释使得丈夫与妻子的不稳定工作有着不同的意涵，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家务分工观念调节着夫妻双方对于工作与家庭关系的认知以及资源、时间、精力的分配，夫妻在性别角色分工认知上一致并偏现代，会显著降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而提升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由不稳定工作形塑的资源状态影响家务分工的方式和机制，受到社会性别化认知的调节。考察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化，既需要关注不稳定工作常态化带来的影响，又要分析男女双方性别观念现代性的同步提升状况。

关键词：不稳定工作；性别观念；家务分工

DOI: 10.13277/j.cnki.jcwu.2025.04.005

收稿日期：2025-03-03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25)04-0036-13

作者简介：刘爱玉，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劳动与性别；姜凤姝，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罗聪聪，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劳动与性别。10087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的重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SH080。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开启了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型构一种新的灵活用工劳动政体的时代。当人们惊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之时，创造经济奇迹的不稳定就业人群的生存境况，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将灵活用工政体下劳动者的就业称之为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其典型特征是不稳定、不可预测和风险性^{[1][2]}。在中国，不稳定工作表现为工作获得方式市场化、劳动关系契约非正式化、任职短期化、社会保障二元分割（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之间）、工作时间的两极化趋向、工作不安全感增加^{[3][4]}。与不

稳定工作相近并且时常混用的概念有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灵活/弹性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非标准就业（nonstandard employment）、非典型就业（atypical employment）、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等。据估算，2018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规模达26459.1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0.9%^[5]。本文作者以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和收入是否低于相应样本中位数的60%作为不稳定工作的综合测量，利用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2021年城镇不稳定工作的比例为58.5%，比1990年的28%增加了30.5个百分点。从性别维度

而言,不稳定工作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其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比如婚姻匹配、生育意愿、家务分工和家庭稳定^{[6][7][8]}。当夫妻中的一方或者两方的就业状况变得不稳定时,家庭生活必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家庭生活中家务的分工安排是否也会因就业状况的差异而呈现性别化的后果?例如男性就业不稳定性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其性别观念的改变以及在家庭承担更多的家务?

我们观察到,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中国女性的家务劳动总量呈减少趋势,如城镇18—64周岁在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由1990年的每日220分钟,减少到2000年的180分钟,及2020年的122分钟^①。但是家庭内的家务分担依然存在性别差距,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仍然显著高于丈夫,承担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务劳动^{[9][10][11]},家务分工依然是传统型的。

本研究试图探讨不稳定工作对传统型为主要表征的家务分工的影响,考察不同就业状况的妻子与丈夫在家务劳动安排上的特点,并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分析:首先是从不稳定就业对资源影响的角度出发,梳理家务劳动研究的相对资源理论(relative resource theory);其次是从不稳定就业的性别化认知切入,梳理性别角色理论(gender-role theory)对于就业与家务劳动时间之间关系的讨论;第三是以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2020)为依据,使用夫妻匹配数据,对不稳定工作与家务分工展开经验研究。

一、不稳定工作、资源受损与家务劳动

不稳定工作会造成个体的资源受损。低收入、收入不稳定、因就业中断或失业导致的收入损失等现象,是不稳定工作的典型特征,它们使个人经济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导致个人财务状况恶化,难以满足个人日常生活需要,无法支撑养家责任^[12]。个体资源受损会改变夫妻相对资源拥有状况,进而可能改变家庭内的性别分工。

家务劳动研究的相对资源视角强调夫妻相对资源的拥有状况会影响家务劳动分工。该理论认为,结构性资源(职业和收入)影响夫妻之间的协商能力,形构了家务分工的格局。资源拥有与家

务劳动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是资源相对拥有状况形塑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家务分工。一方面,夫妻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他/她所占有的市场资源,如收入与职业声望。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等资源在家庭中象征着权力地位和控制力^[13]。在家庭内部,占据更多市场资源的配偶通常拥有更高的权力与更强的控制力,进而在是否参与家务劳动以及参与程度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14][15]}。家庭中的丈夫常因拥有资源优势而在家务分工的讨价还价中胜出,从而尽可能减少其不愿意干的活动,包括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16][17][18]}。另一方面,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力格局受到双方资源依赖关系的显著影响。当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高度依赖强势一方所拥有的资源(像工作收入等)时,这种依赖程度越高,弱势方在家庭决策等事务中的权力就越低。夫妻资源差异导致的经济依赖是考察处于资源劣势地位的妻子家务劳动分担偏重的重要视角^{[17][19][20]}。

二是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影响夫妻关于市场工作、家庭工作与闲暇的分工。新家庭经济学认为,为了使家庭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家庭成员必须分工合作,各自在优势领域进行专门化投资。如同劳动力市场分工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家庭劳动分工也依据家庭成员在不同家庭劳动上的专长,使个人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在性别分工中,女性因擅长家务劳动而更多地承担家庭内部的家务任务,男性则因在收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这种分工安排是夫妻双方为实现家庭资源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21][22]}。男性的有酬工作因此成为其减少家务的重要依据^[23]。

相对资源理论上述两种视角强调了夫妻关系中由资源形塑的权力与利益对于家务分工的影响,能够部分解释现实中一些家庭所存在的夫妻资源状况与家务承担之间的关系^[8],但是过往的研究也揭示了其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就业状态的变动影响了夫妻双方资源占有状况,即使妻子挣的比丈夫多,依然会做更多的家务,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并未随其家庭经济贡献增加而持续减少^{[24][16][22][10][11][20]};无法实现经济上养家的男性反而会

① 刘爱玉、佟新等,2015,以及根据CFPS2020计算。

减少家务劳动^[17]；即使男性不再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提供者，仍不愿意承担家务^[25]，即便女性要求男性能够分担家庭义务^[26]；失业女性仍会承担更多家务^{[27][28]}，但失业男性在家务上给自己的定位依然是帮一下(helping out)^{[7][70]}。学者们一直在探究：为什么双薪家庭中的妻子在拥有与丈夫同等甚至更多资源的情况下，还要做更多的家务劳动？为什么一些妻子在收入超过她们的丈夫时会有家务劳动上的“性别展示”^{[17][10][9][29]}？为什么不稳定工作导致的资源受损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会有性别化的差别？

相对资源视角面临的上述挑战，可能是因为其忽视了夫妻关系中各方所拥有的资源、认知的性别规范及其互动型构的依赖、权力与性别关系合法性特征之间的复杂交织^[11]。社会互动中具有一整套指导人们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稳定而有力的性别规范体系，对家庭内家务分工的性别实践发挥重要作用，这提醒人们去进一步考察家务劳动研究中关于性别角色规范与家务劳动关系的讨论。

二、性别角色视角下的不稳定工作与家务分工

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更多体现着一整套性别观念的作用，而不只是夫妻双方的权力和利益博弈，家务劳动所具有的性别意涵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并嵌入文化结构之中^[30]，传统性别观念将男性建构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并塑造出“男性主导公共领域、女性负责家庭领域”的劳动分工范式。这种劳动性别分工的文化模式并不会因为女性对男性经济依赖减少而同步变化，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常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型。

既往的经验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性别观念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一是相对独立地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从性别视角看，持有平等性别观念的男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越多，持有平等性别观念的女性承担家务劳动越少^[22]；在家庭场域中，丈夫与妻子的性别角色观念从三个方面对家务劳动分工产生影响，并存在性别化差异。首先是丈夫或者妻子如何看待自己应该承担多少家务。其次是如何看待

配偶应该承担多少家务，当夫妻双方越是倾向于持有平等性别观念时，越是会平等地分担家务^{[31][32]}。最后是家务责任相比于社会责任优先性的性别化认知，那些将家庭责任置于工作之上的女性，成为母亲后往往会缩短工作时间，承担更多家务；相比之下，社会文化期待为养家者的男性在成为父亲后，则往往会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家务的分担^[33]。

二是考察性别角色观念与相对资源的交互影响，着重探讨相对资源如何因性别观念而呈现出“性别展示”的问题。研究认为，夫妻相对资源所表现的经济依赖，对家务劳动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遵行的是交换规则，而男性则受到性别文化的影响^[17]。社会性别观念认可丈夫即使挣钱少，也可以少做或不做家务；而妻子不论挣钱多少都比丈夫要多做家务。“性别展示”体现在挣钱比丈夫多的妻子反而需要通过多做家务来展现符合社会期待的女性性别角色，丈夫则是相反的情况，否则都会受到来自配偶或社会的惩罚^[34]。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对于家务劳动分工的期许以及个体对这种期许的认知，会调节经济资源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

工作不稳定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因“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表现出性别化的应对策略。随着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外部劳动力市场波动性加大，夫妻双方都不得不进入非正规就业中以承担养家责任。对于男性而言，这是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观念的延续和深化；对于女性而言，则是在家庭经济压力和分担养家责任双重推力下的必然选择^[35]。但有学者认为，就业状况并未真正改变男人养家的性别意识形态，例如男性失业的家庭，绝大多数家务仍然是女性承担^[27]。这源自性别规范在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上赋予男女两性不同的意涵，男性主要承担了“养家者”的角色，女性常被期待为“奉献家庭”(family devotion)。进而男性会通过多挣钱来显示自身的男性气质，而女性会通过承担家务来维护自身的女性形象^[36]。

与此同时，随着性别平等主义的传播，关于家务劳动的大量研究都发现，性别平等主义的倡导使得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减少，而丈夫承担的家务劳动增加，进而形成夫妻之间更为平等的家务分工模式^[37]。相较于持有传统观念的女性，那些持

有性别平等观念的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量更少；而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的男性则更倾向于以平等的方式分配家务劳动。即便如此，刘爱玉等人的研究发现，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也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10]。这一特征揭示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所具有的形塑作用。

小结来看，性别角色观念视角有助于启发我们关注家务分工所蕴含的性别文化意涵，但上述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推进的地方。一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不稳定工作对家务劳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不稳定工作影响家务分工的具体机制更是缺乏深入探究。二是既有研究缺少将工作不稳定性的影响与性别角色观念结合起来考察，不稳定工作所具有的性别意涵及其可能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三是在性别观念的调节作用上，既有研究较多关注作为个体的男女的性别观念，而较少置于夫妻关系的情境中来细致分析作为配偶的性别观念如何发挥作用。基于此，本研究以夫妻匹配样本为研究对象，以家庭为研究立足点，着重探讨夫妻性别观念的交互作用，来考察与不稳定就业相关的资源、性别角色观念以及家务分工实践之间的关系。

三、工作不稳定、性别观念与家务分工的经验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为了更好地从家庭关系情境中理解不稳定工作、性别观念与家务分工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夫妻匹配样本。CFPS调查以2010年为基线，每2年展开一次追踪调查，CFPS调查涉及家庭关系、家庭经济、工作与收入、家务劳动、态度观念等丰富内容，尤其适合探讨家庭场域中夫妻的就业、家庭内分工与家庭外分工的关系。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界定为18—64周岁在业人群，即以妻子为样本进行分析时，丈夫的年龄与是否在业不做限定；以丈夫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时，妻

子的年龄、是否在业也不做限定。最终符合条件的有效妻子样本为3826人，丈夫样本为4504人。

经验描述与模型分析相关变量的界定如下：

因变量为家务劳动，操作化为平均每日家务劳动时间，根据被访者回答的工作日（周一至周五，赋予权重5/7）与非工作日（周六、周日，赋予权重2/7）每天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进行加权汇总而得，计量单位为分钟数。

核心自变量分为三个模块：

（1）绝对资源。核心考察就业状况、教育、收入三个方面的绝对资源状况。就业状况区分为稳定工作、不稳定工作、自雇农业。就业状况分类的关键是对何为不稳定就业进行界定并测量，本文从劳动关系契约、工作社会保障、工作收入三个维度进行界定：若个人与就业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社会保障、工作年收入高于样本中受访者工作年收入中位数的60%，即视为稳定工作，其余除了包括自雇农业的劳动者都视为不稳定工作^{[38][39][4]}，经分析信度系数为0.64；教育以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受教育年数进行测量；收入是指被研究对象上一个年度的各项收入之和（扣除税和五险一金之后的工资、奖金、现金福利、实物补贴之和），在多变量模型分析时取对数。

（2）相对资源。以职业劳动获得的收入作为相对资源的测量，操作化为经济依赖 $=（本人收入 - 配偶收入） / （本人收入 + 配偶收入）$ ，反映了被调查对象从对其配偶的完全依赖到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的变化。该系数也可以做如下解释：乘以100，负值代表个体分享配偶收入的百分比，正值表示个体贡献给配偶的收入份额^[17]。

（3）性别观念。CFPS2020通过四道题项来测量性别角色观念，分别是：男女分工观念（问卷中问题为“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婚姻观念（问卷中问题为“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生育观念（问卷中问题为“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家务观念（问卷中问题为“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男女分工观念涉及受访者对两性社会分工的看法，是评估个体性别角色认知的关键指标。为与既有研究成果形成学术对话，本研究构建了夫妻性别角色与家务劳动分工的测量变量^[11]，区分为四种典型的匹配类型，即“丈夫传统、

妻子传统”“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以男女分工为例,妻子本人和丈夫的相应回答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者界定为传统,其余的界定为非传统。需要说明的是,“传统”与“非传统”只是一种对于性别观念趋向的大致测量,而不是认为性别观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做出截然区分。

(4)家庭经济贡献认知。这是指被调查对象

基于配偶为家庭经济所做贡献认知基础上的一种总体情感取向。CFPS2020询问的问题是“您对对方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满意?”(1代表非常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

(5)控制变量为:年龄、健在未成年子女状况、居住状况、城乡、户籍、地区、工作时间、自评健康。

以丈夫、妻子各自的日家务劳动时间为核心维度,主要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分布与样本见表1。

表1 不同夫妻就业状况、性别观念下的家务劳动时间

变量名	妻子		变量名	丈夫	
	日家务劳动时间 (分钟)	样本量 (个)		日家务劳动时间 (分钟)	样本量 (个)
妻子就业状况			妻子就业状况		
稳定工作	100	693	稳定工作	64	664
不稳定工作	132	1405	不稳定工作	84	1307
农业自雇	208	1728	农业自雇	142	1613
丈夫就业状况			丈夫就业状况		
稳定工作	112	752	稳定工作	68	950
不稳定工作	148	1643	不稳定工作	73	2208
农业自雇	208	1278	农业自雇	167	1346
夫妻就业状况匹配			夫妻就业状况匹配		
妻子稳定丈夫稳定	95	434	妻子稳定丈夫稳定	62	432
妻子稳定丈夫不稳定	107	214	妻子稳定丈夫不稳定	66	215
妻子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19	17	妻子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05	17
妻子稳定丈夫不在业	124	28	妻子稳定丈夫不在业	-	-
妻子不稳定丈夫稳定	124	266	妻子不稳定丈夫稳定	69	265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稳定	133	901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稳定	74	884
妻子不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46	158	妻子不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58	162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在业	127	80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在业	-	-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稳定	191	51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稳定	91	50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不稳定	192	528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不稳定	85	524
妻子与丈夫均自雇农业	218	1103	妻子与丈夫均自雇农业	173	1039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不在业	179	46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不在业	-	-
妻子不在业丈夫稳定	-	-	妻子不在业丈夫稳定	72	203
妻子不在业丈夫不稳定	-	-	妻子不在业丈夫不稳定	66	585
妻子不在业丈夫自雇农业	-	-	妻子不在业丈夫自雇农业	125	132
夫妻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夫妻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双方传统	200	1328	双方传统	125	1534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144	891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94	1056
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	163	623	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	93	753
双方非传统	122	984	双方非传统	77	1161
夫妻家务分工观念			夫妻家务分工观念		
双方传统	163	295	双方传统	83	374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149	743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83	906
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	154	589	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	105	732
双方非传统	166	2199	双方非传统	107	2492

时间都有适当增加。再来看另一个组合,妻子工作不稳定、丈夫工作稳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每日的家务时间为124分钟,丈夫每日的家务时间是69分。可以看出,丈夫工作是稳定还是不稳定,在家务时间上变化很少,而妻子的工作不稳定,对于妻子而言,家务时间变化比较大,不稳定的妻子的家务时间明显较高。

从夫妻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组合方面看,双方均传统组合中的妻子,每日家务时间最高,为200分钟,双方均非传统的妻子,每日家务时间最少,为122分钟,相应组合的丈夫的家务时间,也有类似特征。

从夫妻家务分工观念组合方面看,丈夫偏非传统者,无论是从丈夫的视角看,还是从妻子的视角看,丈夫承担的家务相对较高,妻子承担的家务相对会较少。不过从简单的交互描述统计可以看到,丈夫的家务分工观念相比于妻子的而言,更有调节作用。

(三)不稳定工作、性别观念与家务劳动时间

表2中的四个模型主要考察了由工作稳定状况形塑的资源及其认知、性别观念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模型1a和模型2a主要考察妻子本人与丈夫本人的就业状况,尤其是不稳定工作的影响。模型1b与模型2b主要考察夫妻就业状况匹配的

情形及其对家务劳动分担的特征。

表3中的模型3a和模型4a是在模型1a与模型2a的基础上,考虑了性别观念及其基于性别观念对丈夫或者妻子家庭经济贡献的认知;模型3b和模型4b是在模型1b与模型2b基础上,加入了性别观念变量。

模型中的核心自变量为本人就业状况、教育、收入,我们可以检验就业类型以及就业的稳定性状况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给个体自主性,并在家务上可能产生的效应,可以检验并对话经典的Gupta关于绝对收入带给个体的自主性及其在家务上的效应的研究^[40]。

模型中的经济依赖和经济依赖的平方项,作为相对资源是一般家务研究中经常予以考察的,经济依赖的平方项是为了检验家务劳动时间是否存在性别表演,以此可以检验并对话Brines于1994年关于性别表演的发现^[17]。

模型中的夫妻性别观念考察的是绝对资源和相对资源因夫妻在社会性别规范上的共识与冲突带来家务分工上的不同效应,性别角色分工观念考察夫妻对于两性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男女应该何者为重以及何以妥协,家务分工观念考察夫妻对于两性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男女应该如何分工。

表2 就业状况对夫妻家务时间影响的回归结果

	妻子家务时间		丈夫家务时间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本人就业状况				
不稳定工作	8.829	-	-5.630	-
农业自雇	56.912***	-	64.974***	-
夫妻就业状况匹配				
妻子稳定丈夫不稳定		10.377		-1.906
妻子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7.311		25.598
妻子稳定丈夫不在业		25.203		-
妻子不稳定丈夫稳定		14.533		1.332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稳定		15.609*		-2.090
妻子不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8.411		70.317***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在业		-1.894		-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稳定		56.044**		13.960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不稳定		52.068***		3.333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自雇农业		70.655***		75.186***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不在业		31.844+		-
妻子不在业丈夫稳定		-		6.043
妻子不在业丈夫不稳定		-		-6.923
妻子不在业丈夫自雇农业		-		34.981**

表2 (续)

	妻子家务时间		丈夫家务时间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工作时间	0.169*	0.148+	0.047	0.041
本人受教育年限	-0.678	-0.539	-0.917+	-0.838
本人收入(对数)	-2.040**	-1.841**	-0.838	-0.963
本人经济依赖	-6.475+	-9.805*	-2.835	-2.819
本人经济依赖平方	-4.356	-0.914	-5.104	-4.391
子女数: 有1个未成年子女	11.643*	11.176*	-2.239	-2.085
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	14.407*	13.793*	-1.829	-1.776
居住情况: 与自己父母同住	-0.405	-0.606	2.551	2.053
与配偶父母同住	1.551	1.614	-6.958	-6.604
城乡: 城镇	-5.075	-3.669	-12.916**	-11.339**
户籍: 非农业/居民户口	-1.871	-1.077	-1.321	-0.082
本人年龄	2.626***	2.584***	0.917***	0.824**
自评健康: 健康	-1.162	-1.199	5.167	5.566
地区: 中部	3.538	3.701	-2.394	-2.500
西部	22.375***	21.475***	27.393***	26.088***
东北	10.830+	9.223	19.181**	18.627**
常数项	16.671	8.856	51.483**	51.438**
样本量	3826.0	3826.0	4504.0	4504.0
R平方	0.168	0.171	0.151	0.155

注:1. +、*、**、***分别表示系数在0.1、0.05、0.01和0.001的水平上显著;2. 参照类:括号内为模型中相应变量的参照类别。本人就业状况(稳定就业)、夫妻就业状况匹配(妻子稳定丈夫稳定)、夫妻性别角色观念匹配(双方传统)、夫妻家务分工观念匹配(双方传统)、对配偶经济贡献满意(不满意)、子女数(没有未成年子女)、居住情况(未与父母同住)、城乡(农村)、户籍(农业户口)、自评健康(不健康)、地区(东部)。

表3 就业状况、性别观念对夫妻家务时间影响的回归结果

	妻子家务时间		丈夫家务时间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性别: 女性	-	-	-	-
本人就业状况				
不稳定工作	9.193		-5.200	
农业自雇	55.494***		64.380***	
夫妻就业状况匹配				
妻子稳定丈夫不稳定		10.148		-1.929
妻子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8.709		29.703
妻子稳定丈夫不在业		28.149		-
妻子不稳定丈夫稳定		14.898+		2.560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稳定		16.126*		-0.481
妻子不稳定丈夫自雇农业		18.017		70.580***
妻子不稳定丈夫不在业		-1.710		-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稳定		57.444**		16.598
妻子自雇农业丈夫不稳定		50.959***		4.086
妻子与丈夫均自雇农业		68.762***		75.229***
妻子自雇农丈夫不在业		33.076+		-
妻子不在业丈夫稳定		-		6.471

表3 (续)

	妻子家务时间		丈夫家务时间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妻子不在业丈夫不稳定		-		-5.617
妻子不在业丈夫自雇农业		-		36.060**
工作时间	0.175*	0.155+	0.035	0.029
本人受教育年限	-0.109	0.012	-0.720	-0.652
本人收入(对数)	-1.996**	-1.811**	-0.834	-0.959
本人经济依赖	-6.718+	-9.895*	-2.929	-2.846
本人经济依赖平方	-4.434	-1.297	-4.555	-3.903
夫妻性别角色观念匹配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18.891***	-18.610***	-4.690	-4.257
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	-15.434**	-14.886**	-10.000*	-9.783+
双方非传统	-19.903***	-19.730**	-5.261	-4.157
夫妻家务分工观念匹配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7.297	-7.133	1.805	2.464
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	-13.472+	-12.466	14.652*	15.208*
双方非传统	-0.557	-0.363	14.947*	15.109*
对配偶经济贡献满意: 一般	-11.652	-12.447	-23.373*	-22.775*
满意	-5.631	-6.089	-12.861	-12.636
子女数: 有1个未成年子女	11.718*	11.324*	-1.489	-1.395
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	14.699*	14.081*	-1.133	-1.162
居住情况: 与自己父母同住	-0.708	-0.893	2.887	2.369
与配偶父母同住	1.688	1.776	-7.551	-7.208
城乡: 城镇	-4.426	-3.086	-12.468**	-10.960**
户籍: 非农业/居民户口	-1.754	-0.940	-1.123	0.174
本人年龄	2.477***	2.439***	0.890**	0.806**
自评健康: 健康	-1.400	-1.509	4.495	4.835
地区: 中部	2.910	3.020	-2.767	-2.912
西部	21.601***	20.739***	26.534***	25.245***
东北	10.621+	9.041	19.447**	18.833**
常数项	40.990+	33.412	58.150**	56.202*
样本量	3826.0	3826.0	4504.0	4504.0
R平方	0.174	0.178	0.156	0.159

注: 1. +、*、**、***分别表示系数在0.1、0.05、0.01和0.001的水平上显著; 2. 参照类: 同表2参照类界定。

对表2、表3各个模型的分析^①, 我们有以下认识:

(1) 不稳定就业、收入与夫妻家务劳动分担。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 不稳定就业并不直接影响妻子或者丈夫的家务分担, 在尝试了不包括自雇农业人群时妻子和丈夫家务影响要素的模型后, 结论依然成立。但是就业状况会通过收入影响家务分配。从模型3b看, 妻子的绝对收入对其家务承担的影响效应显著, 会显著减少其承担的家务劳动时间。但是丈夫的家务劳动承担量并

不随其绝对收入的变化而出现显著的差异。妻子的绝对收入是其本人以及家庭在经济上拥有更多自主性的基础, 具有更高收入的妻子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方式完成部分家务, 从而减少其日常家务劳动的付出。

(2) 相对资源与夫妻家务劳动分担。2020年分析样本中妻子的年总收入均值为23995元, 丈夫的年总收入为41703元, 妻子显著低于其丈夫的年总收入均值。即使是区分就业的状况, 通过夫妻

^① 我们以丈夫、妻子的样本相合进行稳健性检验, 关于核心自变量的影响状况是稳健的。

匹配的就业状况也发现,妻子就业稳定、丈夫不稳定就业时,妻子的年均总收入为45782元,而其丈夫的年均总收入为54639元,不稳定就业的丈夫的年均收入依然显著高于稳定就业的妻子。夫妻就业稳定性差异形塑了两者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以及妻子对丈夫在经济上的依赖,妻子的经济依赖系数均值达到了-0.27,并对于其承担更多的家务有显著影响。模型分析显示,在控制其他各种要素的情况下,妻子经济依赖的程度每降低1个单位,家务劳动可以减少0.043个单位。为了对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时间关系做一个更为直观的展示,我们把经济依赖区分为四个类别,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丈夫70%及以上的妻子,日家务劳动时间均值为193分钟,其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为99分钟,妻子家务劳动是丈夫的1.5倍;那些在经济上依赖妻子70%及以上者,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145分钟,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是118分钟,妻子家务劳动是丈夫的1.25倍。

(3) 依赖、自主与性别观念。根据 Brines 的研究发现,经济上依赖的丈夫在家务承担上存在性别表演,而妻子则不存在^[7]。我们参照 Brines 研究中模型所考虑的核心变量,也分妻子和丈夫分别运行了回归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不存在性别表演。Brine 等学者早年的研究,受限于问卷调查中没有询问性别角色分工、家务分工等方面的态度,因此只是以经济依赖的平方项来考察家务劳动中因为受到性别规范影响所出现的,收入提升但家务劳动反而不增加或者收入减少但家务并不减少的现象。另外 Brines 模型中使用的收入是夫妻总收入,这被一些学者如 Gupta 等批评为忽略了女性本人资源、地位所带来的自主性对于家务分担的效应^[40]。但是 Gupta 模型中的性别观念,只考虑了本人,而已婚夫妻的家务劳动是已经习得了社会性别规范的夫妻在家庭关系的实践中发生的。因此仅仅考察妻子或者丈夫的性别观念并不足够,需要审视夫妻双方对家庭经济贡献、家庭分工、公共领域的社会劳动与家庭领域的私人劳动之间关系的性别化态度,这些态度会影响家务劳动的实践。

在纳入了夫妻性别角色分工契合状况、家务分工观念契合状况、对配偶经济贡献满意度三个变量之后,我们发现此三者对妻子或者丈夫的家

务分工有显著的影响。

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妻子和丈夫的家务劳动有着不同的影响。从妻子的角度看,相比于性别角色观念均为传统型的夫妻而言,丈夫或者妻子一方如果是偏非传统的情况,都会显著减少妻子家务劳动的时间,当夫妻均支持男人和女人在工作和家庭的领域不应该有性别分界的情况下,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最为平等的(“双方非传统”的回归系数值为-19.903)。按照模型 3a 或者模型 3b 回归系数的解读,即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夫妻双方都是非传统型家庭中的妻子,其每日家务劳动的时间会比夫妻双方都是偏传统型家庭中的妻子少 20 分钟。

一个家庭中即使妻子认为男性应该承担一半家务,也不会真的完全体现在家务劳动实践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并未在四个类别的家务分工观念人群中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同样地,男性在性别角色分工方面持有较为现代的观点,并不必然导致其在家务劳动承担上显著增加。不过,如果其在家务分工上确实认为男人也应该承担一半的家务,那在实践中确实会更有可能会多做家务,在模型 4a 和模型 4b 中,可以看到夫妻家务分工观念对丈夫的家务时间有显著影响。相比于与妻子在家务分工上都持偏传统观念的丈夫,持有非传统观念即认为丈夫也应该承担一半家务的男性,其家务时间显著较高。夫妻均传统家庭中的丈夫,其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 83 分钟,夫妻双方均为非传统家庭中的丈夫,其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是 107 分钟(见表 1),比前者多 29%。按照模型 4b 的解读,即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这类丈夫多做家务 15 分钟。如果妻子并不认为男人应该承担一半家务,而丈夫却并不这样看待,这种家务分工观念组合中的丈夫,相比于夫妻双方都偏传统家庭中的丈夫,也会多做更多家务,按照模型 4b 的回归系数,也差不多是每日多做 15 分钟左右。

(4) 家庭责任与夫妻家务劳动分担。家庭责任对家务劳动分担的影响在妻子与丈夫之间存在差别。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每日家务时间会显著增加,而丈夫的家务时间则不受子女状况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2020年18—64周岁在婚妻子每日家务时间为其丈夫的1.61倍,妻子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虽然夫妻之间在家务劳动上的差距已被诸多研究所揭示,但分析这种差距的意义在于如何进一步理解这种差距的成因。

日益增加的工作不稳定必然会影响到家庭中的男男女女,影响到家庭资源的供给与配置、家庭内部的分工与合作以及夫妻关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研究发现,不稳定工作对于家务分工的影响需要置于家庭中夫妻关系及指导这种关系的文化架构下。

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作为妻子的女性的不稳定工作与作为丈夫的男性的不稳定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从之前的统计分析已经看到,社会上男性的不稳定工作的收入比女性高,家庭中不稳定工作的丈夫的收入比妻子也是不稳定工作时候的高,甚至比妻子稳定工作的收入还要高。以CFPS2020年数据为例,稳定就业的妻子其年均总收入为45782元,不稳定就业的丈夫的年均总收入为54639元,显著高于稳定就业的妻子。我们可能预设不稳定就业的员工收入低于稳定就业,因此妻子稳定就业、丈夫不稳定就业的情况下,妻子的家务时间会减少,丈夫的家务时间会增加。现实中,虽然不稳定就业的丈夫的收入确实少于稳定就业的丈夫,但是平均而言,在家庭中其收入依然高于妻子。因此,从提供家庭经济收入这种绝对资源的状况看,男性依然相比于其妻子有更多的贡献,由资源带来的个体自主性及其对家务承担的效应依然存在。从相对资源的角度看,妻子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依然小于丈夫,其在经济上对于丈夫的依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即使按照相对资源理论的逻辑,夫妻家务承担的格局也不会因为不稳定就业而发生根本改变。

其次,需要充分认识到妻子与丈夫的不稳定工作在家庭场域被赋予的性别化意涵。当越来越多的人群卷入不稳定工作关系之中,稳定工作日益成为少量人群的特权之时,本来被大众赋予不稳定工作的污名也会随之弱化,一个不稳定工作的丈夫能够挣得比妻子多,依然会被很多人包括妻子认为是家庭经济支柱。我们看到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家务分工观念调节着妻子、丈夫对于工作

与家庭关系的认知以及资源、时间、精力的分配,尤其是夫妻双方在认知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夫妻在性别角色分工认知上一致并偏现代,会显著降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而夫妻在家务分工上的性别化认知一致并偏现代,会显著提升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

最后,资源对于家务分工的作用方式和机制,仍然要考虑社会性别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在家务劳动分配中,夫妻并非个体化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只是基于就业、收入等个体资源及其优势来考察家务分配。考察性别观念的现状及其变化,有助于解释甚至预测家务性别分工的走向。而现实问题是,家务性别分工的观念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与西方社会类似,在总体上,中国女性的性别观念更趋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41]。两性性别观念变迁的差别不仅是社会上男女之间的,也是家庭之中的,这意味着一些夫妻的性别观念会存在差别。以对男女性别分工的观念为例,夫妻都偏传统的占比最高(约35%),夫妻中有一方偏传统者合计39.3%,夫妻性别观念一致并都偏现代的占25.7%。虽然在关于男人家务的认知上,多数夫妻均持有非传统观念,但是在影响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实际效果上,男女双方的性别分工观念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

将不稳定工作、性别观念与家务分工关系的探讨置于历史脉络来看,我们发现中国1990年到2010年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工作的灵活化,其中相当大比例的劳动者出现了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与此同时,性别观念也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现象^[42]。2010年以来通过各种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以及两性在教育上差距的缩小,社会又出现了性别观念平等化趋向。从宏观层面上看,2010年之前两性性别观念的传统回归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符合现代化理论关于性别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理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由一套独特的两性应该如何承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责任(特别是家务分工)的理念为基础的,这种关于性别分工的理念也有着传统文化的根基。虽然从现代化理论视角看,女性就业的不稳定与性别观念的传统回归,对于女性而言是性别平等

化事业的受损。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恰恰是由女性这样的贡献所型构的,“男女内”以及家庭事务上的合作,实际上也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大规模农业户

籍人口流动以及家户分离的城镇化,也即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就有着女性在夫妻性别分工与家庭代际分工合作中的贡献。只是女性的这种贡献,远未获得以经济货币表现的符号的足够承认。

【参考文献】

- [1] Kalleberg A L.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9,(1).
- [2] Kalleberg A L, Kevin Hewison. Precarious work and the challenge for Asia[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14,(3).
- [3] 刘爱玉,黄俊平. 就业不稳定与无保障:基本表现、成因与前景[J]. *中国青年研究*,2012,(4).
- [4] 刘爱玉,刘继伟. 市场化过程中就业脆弱性之演变(2000—2010)[J]. *河北学刊*,2020,(1).
- [5] 赵新宇,郑国强.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
- [6] Kalleberg A L. Job insecurity and well-being in rich democracies[J].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2018,(3).
- [7] Rao A H. Crunch time: How married couples confront unemployment[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0.
- [8] Warren T. Work-Time, male breadwinning and the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ur: Male part-time and full-time workers in unsettled times[J]. *Sociology*,2022,(1).
- [9] 贺光桦,简敏仪,吴晓刚. 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究[J]. *人口研究*,2018,(5).
- [10] 刘爱玉,佟新,付伟.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J]. *社会*,2015,(2).
- [11] 刘爱玉. 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的夫妻家务劳动分工[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2).
- [12] Schneider D, Harknett K. Consequences of routine work-schedule instability for worker health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9,(1).
- [13] Perrucci, et al. Determinants of male family-role performance[J].*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1978,(3).
- [14] Blair S L, Lichter D T. Measuring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Gender segregation of housework among American couples[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1991,(12).
- [15] Ferree M M.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wo-earner marriages: Dimensions of variability and change[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1991,(2).
- [16] Bittman M, England P, Folbre N, Sayer L, Matheson G. When does gender trump money? bargaining and time in household work[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3,(1).
- [17] Brines J.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3).
- [18] Evertsson M, Neramo M. Dependence within familie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mparing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4,(5).
- [19] Greenstein T N. Economic dependence,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home: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2000,(2).
- [20] 於嘉.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 *社会*,2014,(2).
- [21] Coverman S.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J].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85,(26).
- [22] Presser H B. Employment schedules among dual earner spous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by gender[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4,(5).
- [23] Maume D J, Hewitt B, Ruppaner L. Gender equality and restless sleep among partnered European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8,(80).
- [24] Baxter J, Hewitt B, Haynes M.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housework: Marriage, parenthood, and time on housework[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8,(70).
- [25] Miewald C E, Eugene J M. Gender struggle, scale, and the production of place in the Appalachian Coalfield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2004,(6).
- [26] Sherman J. Stress that I don't need: Gender expectations and relationship struggles among the poor[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7,(3).
- [27] Gough M, Killewald A. Unemployment in families: The case of housework[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1,(5).
- [28] Tanja V D, et al. Unemploy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in Europe[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018,(4).
- [29] 孙晓冬. 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J]. *社会*,2018,(5).

- [30] Jiping Z, Bian Y. Gendered resources,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 a case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1,(4).
- [31] Shelton B, Daphne J.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6, (22).
- [32] Cunningham M. Parental influences on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work[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1,(6).
- [33] Sanchez L, Thomson E. Becoming mothers and fathers: Parenthood,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J]. *Gender and Society*, 1997,(11).
- [34] 左际平. 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J]. *妇女研究论丛*,2002,(1).
- [35] Warren T. Conceptualizing breadwinning work[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007,(2).
- [36] West C, Zimmerman D H. Doing gender[J]. *Gender and Society*,1987,(1).
- [37] Carlson D L, Lynch J L. Housework: Cause and consequence of gender ideology?[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3,(6).
- [38] Young M C.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carious work settings[J].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0,(1).
- [39] Kyrrä T, Arranz J, García S C. Does part-time work help unemployed workers to find full-time work? Evidence from Spain[N].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0770. Bonn: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2017.
- [40] Gupta S. Autonomy, dependence, or displ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ed women's earnings and housework[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7, (69).
- [41] 刘爱玉,佟新.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J]. *中国社会科学*,2014,(2).
- [42] 刘爱玉. 男性养家观念的变迁:1990—2010[J]. *妇女研究论丛*,2019,(3).

责任编辑:杨 春

Precarious Work,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A Study Based on the Couple Data of CFPS2020

LIU Aiyu, JIANG Fengshu, LUO Congc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upl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20),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arious work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in family. It is found that the normalization and de-gendering of precarious work shape couples' absolute and relative resources. Husbands mainta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relative resources. The gendered framework of work endows different implications to precarious work between spouses. The concept of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moderates the cognition of couple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s well a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ime, and energy. When couples share congruent and relatively modern perceptions of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it significantly reduces wives' housework time while increasing husbands' housework tim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resources shaped by precarious work affect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is embedded in gender norms. Examining the equalization of 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requires not onl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precarious work but also an analysis of the synchronous modernization of gender attitudes among both men and women.

Key words: precarious work; gender role attitudes; division of housework